

從食貨到經濟

歷史語意上的「二階觀察」

◎湯志傑

所有的歷史書寫不可避免地是當代的書寫，於是乎，如何可能「如實地」重構過去的歷史實在，便成了史學界恆久的爭論與關懷所在。我們無意在此涉入這一論爭，而只想指出，「社會的「歷史圖像」之所以改變，不單源自於當代基於符合認知或其它的理由，認為會對哪些人們值得報導的事實進行選取與渲染；而且也在於這樣的改變是在選擇性的構成條件中發生著的，尤其是在無法揚棄下述這個可能性的情況下發生著的，亦即，其它的可能性在今天也是可能的。」（註一）隨著所謂「語言學的轉向」的出現，隨著人們強調溝通，現在我們或許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觀察與重構歷史。語言，以及由它所代表的溝通，或者說社會系統，自然是我們這裡所關注的重心。然而，單單強調語言的重要與

作用卻可能陷進一個由語言本身所構築成的陷阱。撇開所謂的 Whorf-Sapir 假說，亦即語言決定論這樣的看法不論，我們是否能夠說，只要特定的稱謂、特定的措辭在過去的歷史中未曾出現的話，便表示由這個稱謂或措辭所指稱的事物在過去不會出現過？（註二）我們顯然無法對此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因為這牽涉到語言，尤其是文字作為符號（Zeichen）來說，是意指（Bezeichnend）與意指（Bezeichnete）的統一的問題。能夠流傳到今天而為我們所看到的，多半是那些作為物質性記憶的載體。（註三）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直接就以意指代表了意指與意指的統一。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看法仍然停留在物的圖式（Dingsschema）的觀察方式，也就是把符號當做物來進行一階的觀察。對我們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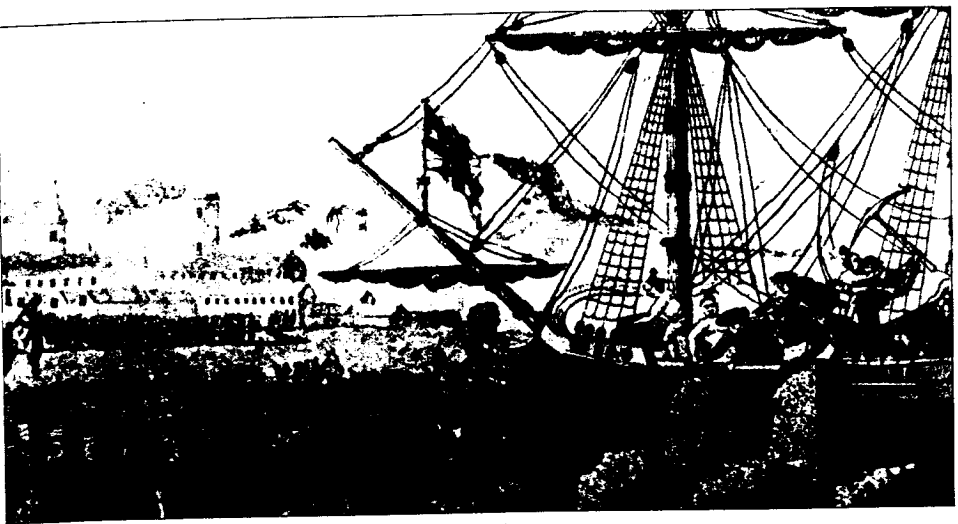
（第一五五期）2000. 7. 1

從食貨到經濟

，重構歷史的新途徑卻在於由二階觀察所帶來的可能性。循此，我們關心的是，人們如何觀察，尤其是人們使用了怎麼的區分來進行觀察。在此，符號成了我們藉以認知人們如何觀察的媒介。如 Spencer Brown 所闡明的，觀察必然是建立在指稱／區分這樣一個區分的基礎上。（註四）換言之，不存在著純粹的指稱本身，指稱必然伴隨著一個區分而出現。所以，當我們要進行二階觀察時，便不能只把目光投向指稱而不將其背後的區分考慮進來。換到符號的脈絡來說，這意謂著我們始終必須以意指／意指這組差異來理解、掌握符號。

正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下，有理由以功能分化作為我們的觀察圖式，對過去的歷史發展進行二階觀察。在功能分化已成爲不可避免的現實這個前提下，這樣的歷史重構尤其顯得必要。然而，這麼做的目的並不在於證明中國或台灣過去有著平行於西方或甚至較西方爲進步的發展，或者過去已有著現代發展的因子，也不是要以今天的觀點強加在所謂的過去的歷史實在上，以塑造出共識，獲得化約未來複雜性的功能。雖然，歷史必然有著這樣一個化約複雜性以面對未來的功能，但是，這樣一種粗暴的外部觀察的做法在今天的情境下已很難令人感到滿意了。因爲，藉著系統理論的洞見，我們已了解到對非恆定的、自我指涉的系統來說，歷史並不就完全決定了未來的狀態。對外部觀察者來說，這樣一個決定過程尤其是不透明的且無法取得任何介入管道的。同時，儘管社會的自我描述（以及因而：批判）可以表現得一副於社會的樣子，但事實上任何社會的自我描述不可避免地是全社會的運作的一部份。換言之，我們的描述也

當代



十八世紀的人會說：「沒有市場的話，就沒有經濟，只有維生。」



農事之
神農氏之
龍而主神農人
於江水因以爲
曰炎帝以火名
相操木爲耒耜
教萬人始教於
氏周書曰神農
東神農運耒耜
神農氏之

神農以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CON-TEMPORARY

可能成爲系統歷史的一部份，從而影響到系統未來的發展——雖然這將以我們所無法預估的方式進行著。(註五)因此，在嚴肅對待社會系統所具有的自我指涉性質的情況下，我們嘗試進行的毋寧是一種內部的觀察，試圖從現在的觀點出發去把梳過去到現在的演變——儘管我們同時也意識到，在此，科學系統與其它系統的差異依然是無法泯滅的。

春秋戰國之後經濟成爲論題化

就經濟的功能在於對需求的滿足進行安排來說，經濟始終是全社會系統的一個功能，而不論它是否分化出來。(註六)換句話說，我們無法設想有一個不必顧慮需求滿足的社會；這同時反面說明了，光憑功能是無法分化出一個系統來的。十八世紀時的人便會如此說道：「沒有市場的話，便沒有經濟，而只有維生。」(註七)亦即，在缺乏市場交換的情形下，經濟是無法分化出來成爲一個系統的。因爲，就社會作爲一個整體來說，不可能本身就構成一個單一的維生單位。如此一來，經濟的功能固然得以透過維生的生產而得到履行，但各自零星散佈著的自足的維生單位，卻無法連結成一個得以與環境區別開來的系統，經濟的運作依然局限在各個維生單位中而彼此得不到銜接。(註八)依系統理論的構想，市場與符碼化才是使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的關鍵所在。但是，詳細探究此過程之前，必須先釐清一個問題，也是本篇的主旨所在：究竟在傳統中國，人們是如何看待經濟的，換言之，是用什麼區分來指稱經濟的。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傳統上與經濟事務相關的辭彙包括了富國、富民、富家、貨殖、食貨、平準、理財、治生、資生、生計、經世乃至「經濟」這些措辭。在某個意義上，這些辭彙的出現就暗示著經濟已開始分化出來。因爲，觀察往往是後於運作的，而語意與現實運作之間往往有著一個時間上的落差。(註九)唯有當經濟分化出來了，人們才需要也才會使用這些語彙來指稱之。就中國的例子來說，情形正是如此。隨著市場的出現以及井田制度所帶來的擁有／不擁有這組符碼化的產生，經濟系統分化出來的過程就啓動了。(註十)上述語彙首度大量出現的春秋戰國時期，正是傳統封建身秩、階序、秩序日漸崩潰以及私人土地所有開始出現這樣一個社會結構劇烈變遷的時代。

依《尚書》《洪範》篇的說法，武王克殷後箕子所提出的統治建言中，包括了所謂的農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註十一)這樣一種以食爲第一優先的談話方式，反映出維生的思考邏輯擁有支配性的地位，而就貨物列爲第二順位來說，商品的生產與交換顯然也已爲人們所注意。《周易》《繫辭》更敘述神農以「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另外並有「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這樣的說法。可見人們不只注意到財貨與需求滿足的關聯，而且已進一步從交換與經理的角度來考慮這樣關聯在公共生活中的意義了。不過，通觀東周以前的典籍，我們得到的印象卻是，隨著農業定居、社會及政治制度的出現，人們固然已開始對維生進行論題化，倡導耕稼的重要及交易所帶來的好處，但還沒有明確地提



周文王與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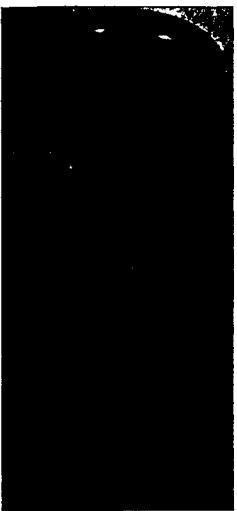
當代

〈第一五五期〉2000·7·1

出藉以概括經濟事務的辭彙來。「食貨」一詞尚未如同後世般運用以指稱經濟事務，「理財」一詞似亦只限於王室財富或國庫的經營，而不及於一般人民，且僅於《周易》《繫辭》出現過一次而已。(註十二)

東周以後，舊有封建宗法秩序解體，群雄爭霸於焉展開，如何建構新秩序成爲當時主要的課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維生生產不單是個經濟的問題，更具有政治上重要性，因而也給納入建構新秩序的論述中，論述的重點則在作爲競爭基礎的富國強兵的問題。不過，春秋時期雖也講求爭霸，但以尊王攘夷爲價值理想，是以，政治、軍事的競爭某個程度上仍受倫理節制。到了戰國時期，軍國主義興起，各國皆以兼併爲目的，富國強兵遂成爲唯一具支配性的政治語意。(註十三) 在這樣一個群雄並起，衆人咸認「天下定於一」(孟子語)的情形下，即便身處春秋時期且「罕言利」的孔子(《論語》《子罕》)也不得不對政治——尤其是國家如何對待

散氏盤正顯示封建宗法秩序的解體。



《第一五五期》200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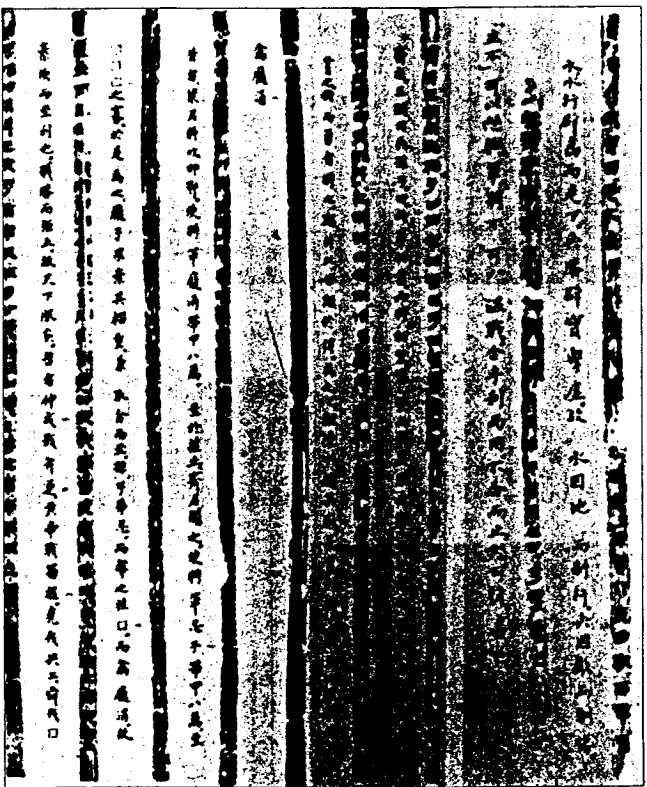
從食貨到經濟

(四) 也成爲據以指稱整體經濟事務的代表性措辭。(註十四) 在實際的議論中，作爲區分其中一邊的富國有著許多不同的指涉：一方面可以指國庫或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同時也可以指王室財富的增長。在講求農戰合一、中央集權的法家論述中，富民是從屬於富國的，是富國的一個手段。雖然，在避免殺雞取卵的考慮下，富民進到了法家的論述之中，但基本上仍停留在未被標記的那一邊而不具有被指稱的價值。(註十五) 就被標記了的富

國這一邊來說，也沒有必要進一步區別其不同的意義指涉，因爲不論指哪一種意思，都是法家所企求的目的，儘管這之中還是有著畸輕畸重之別。依儒家以禮樂教化、透過「先富後教」以建立起德治秩序的主張來看，則不論是王室財富的增長或國庫財富的增長，都不是行仁政，而是對百姓的搜括與聚斂，是該「鳴鼓而攻之」的。(《論語》《先進》) 就此來說，富民與富國是個零和且對立的關係。唯有當富國指的是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時，才能得到儒家的贊同，並認爲這無非便是富民；在此，區分的界限又取消掉了。相應地，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 國家或君王本身並不具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可言。

處於戰國晚期兼井日益激烈的荀子，雖仍服膺儒家「藏富於民」的主張，但在時代的壓力下，也不得不一反儒家以富民爲標記的傳統，而標舉著富國的大旗。他不僅區別了富國的不同意涵，(註十六) 並且清楚地指出，因著富國途徑的不同(並相應地意指不同的「富國」

經濟的問題——做出回應，從而提出了像「庶、富、教」這樣的階段性政策重點，(《論語》《子路》) 或是像「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樣的看法。(《論語》《季氏》) 他的弟子有若更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 由此進一步引出了富民/富國這樣的區分，同時，富國(或富民



管子

CON-TEMPORARY

()，富國與富民可以有著對立或統一的關係，而唯有在統一的情形下，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富國。因爲富國是要「兼足天下」、「上下俱富」，而且「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筮倉廩者，財之末也。」(《荀子》《富國》) 換言之，在荀子看來，不論富國所企求的是國家整體財富的增加，還是國庫的增加，都得藉由富民來實現，其途徑則在於發展生產。不採取鼓勵生產而一味「好取侵奪」，像商鞅所主張的「一家不積粟，上藏也」(《商君書》《說民》) 這樣的集權化措施，固然可以暫時豐贖國庫與王府，但這是竭澤而漁，無從真正實現富國的目的，反會造成富國與富民的對立，進而導致國家滅亡。強調藉由經濟發展以達成富國目標的《管子》一書也提出了類似的議論，所謂「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管子》《君臣上》)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從經濟的觀點談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

「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管子）（重令）「府不積貨，藏於民也」。（管子）（牧民）有時甚至認為，任何的賦稅都是對人民的剝奪，必然會引起反感，而且會破壞生產力，應當廢棄；主張國家要做到「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其主要途徑是參與到市場中，以寓稅於價的方式，透過國家操縱貨幣與價格的能力來獲得財政收入。（註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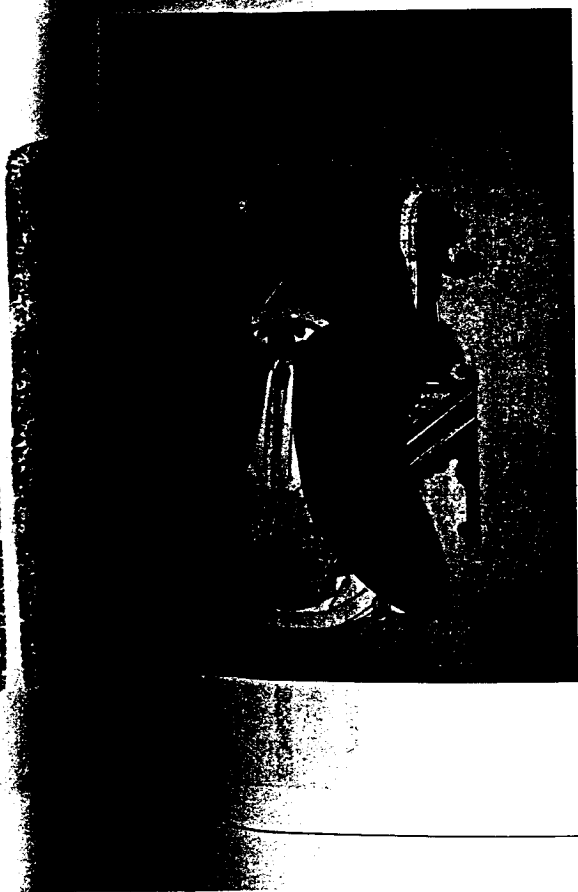
很明顯地，不論是農用八政所談的食貨，還是富國／富民這樣的區分，基本上都還是從政治甚至只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來對經濟進行論題化的，而不是像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般，是從經濟的觀點談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而且，隨著兼并戰爭的日益劇烈以及統一及安定的日益渴望，即便只是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儒家也只能試圖謀求富國與富民的統一，而不再能將所謂的國

墨子強調「食者，國之寶」，後來強化成「民以食為天」的話。

家利益屈從於人民的利益之下，國家本身獲得了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利益的實體這樣的地位，遂愈發突顯出來。經濟系統的分化只是諸子百家的論述

正是基於這樣的情形，而主要在富國（或富民）的論述架構下，來開展關於經濟問題的具體議論。滿足維生需求的問題，是眾人首要關注的焦點。自孔子「足食」之說以來，便不乏與此相關的討論，像《墨子》《七患》便提到「食者，國之寶也」，食的強調到後代更鞏固下來成為「民以食為天」這樣的語意。循此，議論的重點都放在農業生產的強調上，尤其是從本（農）／末（商）這組區分來開展其議論。在滿足維生需求的脈絡下，進一步考慮了影響生產與財富增加的因素並提出了

孔子的「足食」之說，正顯示經濟問題的重要。



《管子》（書影）一書，特重土地。

一些實際的做法。其中，人口增加往往不視為是值得追求的目標，而且也看成是財富增長的基礎。孔子便會表現出「庶矣哉」的讚嘆，墨子則以「人口衆」為治國目標，並以「強從事」，亦即提升勞動強度，為生產得來以提昇的途徑，而隱然將人口增加與財富增長關連起來。基於這樣的理由，才能理解他「唯人為難倍」的感慨。（註十八）此外，還從生產要素配置與有效利用的角度討論了人口與土地，以及因而與生產及財富增加的關聯。在魏推動改革的李悝首倡「盡地力」之說，《管子》《霸言》則明白地指出「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商君書》《算地》更說「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事徠」，（註十九）在農業仍為社會主要生產部門的情形下，土地是主要的生產工具，即《禮記》所謂「有土斯有財」。孟子提倡「經界」，以「制民之產」為目的；《管子》則有「正地」的說法，重點在「均地分力」。商鞅



商鞅銅方升格銘文拓片。

變法，「開阡陌封疆」以「制土分田」，正式以法律確立土地私有買賣，更是劃下先秦社會變革的一個句點。（註二十）所以，對於土地這個重要資源的運用進行論題化的脈絡，除了充分利用地力這種較純粹經濟性的想法外，還同時存在著為民制產以解決人民維生及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以及擴大稅基以增加國家稅收等等混雜著政治與經濟的考慮。

崇儉、反奢也是這個轉變期中常被論題化並為各方所共同主張的看法，但卻往往是基於不同的出發點。像儒家主要是出於封建身份禮制的考量而反對因著僭越而來的奢侈，或是基於「與其奢也，寧儉」這樣的道德考量。墨家則以「生財密、用之節」為富國的兩項法門，而尤重節用；凡是超出維生所需、超出「有用」這個標

準之外者，都是奢侈消費。他們將重點置於重分配的面
向，反對統治階層的奢侈消費，以改善一般平民的生活
水準。一直要到荀子提出「強本節用」的說法，主張「
節用裕民，而善藏（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
易，則出實百倍」，節儉／奢侈這組區分才與生產關聯
起來。換言之，荀子不再只是從倫理與德性的脈絡來談
論節儉，不再把節儉當作目的；同時，重點也不再放在
消極地省下剩餘以確保未來的維生所需，或是限制統
治者的需索以充裕人民的所有，而是透過節儉這個手段
累積剩餘，以擴大再生產，正面地回應確保未來需求的
問題。從發展生產才是財富增加的真正基礎這個看法出
發，荀子並且批評墨家過於強調透過節用以進行重分配
的危險：在生產沒增加的情況下，這可能反「使天下貧
」。(註二)

另外，「理財」這個措辭在先秦時期似仍未得到進
一步的開展，從而成為經濟事務的概括指稱。不過，參
雜著周代典章制度的記載與作者所擬想的理想規劃的《
周禮》一書，與強調漁鹽之利、工商發展的《管子》中
，已出現了許多後世指稱為關於「理財」問題的討論。
像《管子》便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提出了「德有六
興」的說法，亦即政府有興辦六項德政的責任，尤以基
礎建設與濟民之急為核心。在指出政府興辦基礎建設責
任的同時，人們也注意到了藉此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
依《管子》一書的見解，「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
」。換言之，政府不能消極地期待人民將剩餘再投入生
產之用，而應主動地鼓勵生產，是以富國之途在於「山

《第一五五期》200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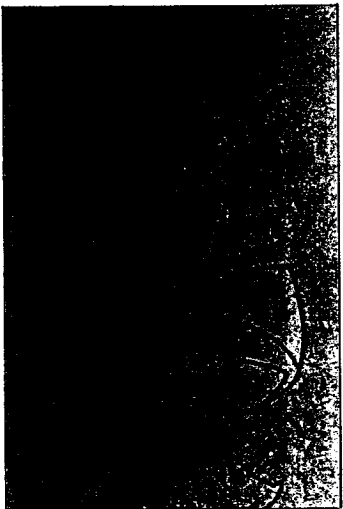


秦始皇建立了一個士、農、工、商階序的帝國。

，一來由於秦始皇焚書的影響，再者隨著帝國一統後重
新建立了一個士／農／工／商的階層秩序，使得其他的
觀察方式在後來日漸喪失了銜接，於是我們今天少能看
到相關的資料。即便如此，《史記》《貨殖列傳》中，
依然保留了些許不同觀察方式的痕跡。依「本紀」、「
世家」、「列傳」這樣按著身份階序來安排其章節的記
傳體史書中，布衣商人能夠以「素封」躋身於「正史」
之列，不能不看成是市場經濟發展以及連帶地經濟分化
出來的結果。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內聖外王傳統下的
經世濟民、致太平之術，也不是軍國主義下的富國強兵
之策，而是如何攫取市場機會的智慧。透過史家之筆，
我們才稍稍碰觸到了某個意義下可以視為是當時經濟系
統的自我觀察，而不再是嵌在政治—倫理脈絡中的各家
學說。貨殖一詞的選用，表明了關注的焦點從單純的維
生轉向作為經濟系統自我生產的基礎的貨幣。在此，被

澤救於火，草木植成」、「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
、「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六畜育於家，瓜瓠
薑菜百果具」、「工事無刻鏤刻，女事無文章」，亦即
「強本事、去無用」，如此國家財政收入方有充足的來
源，彷彿「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註二)
《周禮》則着眼於平穩物價（尤其是糧價）、政府興辦
借貸事業與荒政。依其構想，政府不必以權力為手段，
強行干涉經濟活動，主要是以豐厚的資源為後盾，採用
市場公開操作的原則來影響資源的配置，並避免貧富過
於不均。

儘管隨著經濟系統的分化出來已出現了上述種種與
經濟有關的議論，但是這些議論基本上都還是嵌在諸子
百家政治學說的脈絡中，而未獲得獨立的觀點，遑論成
為一門學問。事實上，在戰國那樣一個變動時期中，從
政治的觀點對經濟論題化並不是唯一的觀察方式。只是



荀子不再把節儉當成目的，而是透過此以累積剩餘，再擴大生產。

當代



布衣商人能夠以「素封」躋身「正史」，這是「共官操吏」圖摹本。

論題化的是富家與治生，而不是富國或富民。(註二四)
換言之，觀察的出發點不再是統治者，而是在日常生活
中直接面對需求滿足問題的升斗小民。

透過這些商人所做出的經濟系統的自我觀察中，首
先引人注意的特徵是普遍地強調「一時」。這些商人眼中
的時，不再是先秦諸子在維生經濟的脈絡中所談的農時
問題，不單意指一般性的時間而已，更意謂著時機，以
及，如果容許我們如此詮釋的話，市場機會。「時」的
強調反映出隨著經濟系統分化出來，人們覺察到了經濟
系統擁有自己所特有的時間與節奏。相應地，強調的重
點便在於權衡及迅速反應，好比「與時逐」、「觀時變

「趨時若猛獸鷓鴣之發」。在與「自然時間」的關聯中，他們還在傳統星象學知識的基礎上，發展出自己一套預測農業生產豐歉以及連帶地預測市場行情的技術，以在市場上攫取利潤。(註二五)話雖如此，獲利的唯一途徑自然仍在於買與賣(或者，支付與不支付)的行為。唯有在正確的觀點下做出及時的決策，屯積所欲求的商品待價而沽，才能獲利。在此，商人從經濟的眼光將傳統的「仁」這個德目重新詮釋為施與予的關係，強調的是供與需求的敏感度。另外，他們也提出了價格運動原則的觀察，好比像「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註二六)更值得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守財奴的做法，這些商人清楚地認知，唯有將貨幣支付出去才能達到增加貨幣的目的，因而主張「無息幣」，強調要讓貨幣始終處於流通之中。(註二

司馬遷為商人立傳，揭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觀點。



七)這樣的認識並不是使用貨幣便自然出現的，而反映了貨幣對經濟系統的二度符碼化已趨於成形。

治生一詞同時體現了人們從經濟的脈絡對經濟事務所做出的概括指稱，由此開展出不同於富國論述的傳統。司馬遷為商人立傳的同時，揭開了自由經濟的觀點，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此，視追求利潤的活動正當且自然，突破了傳統上將經濟活動嵌入道德脈絡的想法。(註二八)在司馬遷的筆下，農、工、商、虞皆為治生之道，士反而不與焉，將觀察角度從政治轉移開，而以私家的經濟活動為主要的論題化對象。對他來說，這四者是「衣食之原」，「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循此，貧富差距來自巧拙之不同，「貨殖家」不必然要受到道德的譴責。觀察到收取地租致富，非但較穩定且可靠，同時社會地位也較高，經營工商風險大，社會地位又低；他歸納出「本富為上，末富次之」的結論。但他同時也注意到經營末業致富卻比本業來得快而有效，是以「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在以自利為人的本性及分工能帶來利益的看法下，司馬遷認為經濟活動能自發地形成秩序，毋需干涉。所謂「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勤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將，而自然之驗？」主張一種類似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註二九)

隨著百家爭鳴時代的過去，社會的自我觀察與描述，包括對經濟系統的自我與異已描述在內，便落入到士

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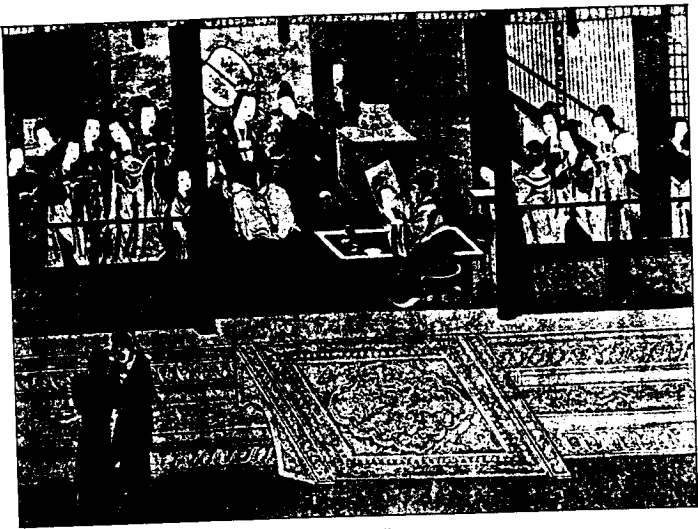
CON-TEMPORARY

從食貨到經濟

／農／工／商與本／末的單一脈絡去了。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漢書》又回歸《尚書》的傳統，以食貨一詞取代了貨殖的篇名，自此以後，這個指稱便為歷代正史沿續下去。(註三十)在政治佔據著社會的中心位置，士大夫階層充當社會代表的情形下，經濟的論題化多半便由這些嫻熟文字與書寫的士大夫來做。他們很自然地會從自身的立場出發把經濟論題化，而且就「代表」社會這點來說，他們也無須考慮到其他不同的觀察立場。於是乎，從政治的觀點、出於經世濟民之念來對經濟進行論題化，便成了之後主要的觀察模式。

治生成為現實生活的必要

漢朝新出現而涉及經濟事務的指稱的語彙，主要像平準、均輸、榷酤這類涉及實際政策的，所指稱者多半與政府透過政治手段參與或介入市場的運作有關。這樣的轉變與整個社會情境的變遷有關：隨著政治的一統，往昔的國際貿易現在變成了國內貿易。(註三一)貿易競爭不僅喪失了國家的支持，反而成為政治亟欲加以調控的對象，同時，戰國以來因市場經濟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在一統的情況下已成為統治者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因為正如如Bosworth關於官僚帝國的著名分析所指出的，當君王藉分化出來的自主力量與自由浮動的資源之助，達成集權中央並建立起官僚統治後，他不再需要如此地依賴這些力量與資源，反而開始擔心過度發展會損及其傳統的正當化原則與統治基礎，所以開始加以限制，(註三二)這具體反映在像平準、均輸這樣的抑商政策



漢朝透過政治介入市場，這是「漢宮春曉圖」，可見當時貴族的生活。

上。又且平準、均輸等政策構想雖未對整體經濟事務提出新的界定，但將焦點置於交換領域的做法卻開啓了多有些不同的觀察角度，逸出傳統以務農為致富主要途徑的富國論述之外。除了籌措財用以備邊防這個實際的理財考慮外，以壟斷鹽鐵為核心的平準政策更觸及了財富分配的問題，從而與排除富商大賈進行兼井，確保平民百姓的生計，謀得政權穩定等問題有關。(註三三)因此，儘管在語意的層次上並未提出新的界說，但卻從政

治的角度關照到了新社會情境下經濟問題的關鍵所在。依筆者目前所能掌握到的零散史料來看，一直要到東漢中期王符的「政論」與崔寔的《四民月令》（原本現均已佚），外於政治脈絡的治生、富家這樣一種論述傳統才稍稍得到接續。然而，王符雖然不像先前的議論一般，將工商簡單地等同於末業，而是將本／末這組區分再度應用到工商之中，從而提出一致用為本、巧師是末；通貨為本，鬻奇是末」的看法，將滿足維生所需與奢侈性消費區別開來。但是，他所嘗試的，仍然是以價值來制約交換，所依據的依然是套政治——倫理學說。相應地，對他來說，富民是整體國民財富的增長，是正當且有益於國計的，是統治者該當從事的義務。富家則不過是富個人，國家不必然因此而富。（註三四）屬於個體經濟範疇的富家論述，不但與屬於總體經濟範疇的富民論述分割開來，甚且走向對立。

崔寔的《四民月令》方才真正稱得上是「生計之學」。（註三五）這本書仿效關於政府每月例行活動的規定與記載這樣的體例，提出一套平民百姓持家治生的行事指南。雖說作為借鑑的是政治系統的自我觀察與描述，但出發點與論題化的對象卻都屬經濟系統。在此，四民分化與本／末區分依然是據以進行觀察的單一脈絡。不同於以往的是，有意識地視家戶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強調的重點則是如何在士、農、工、商四種不同的職業與角色間進行組合。司馬遷所描述的「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商人作為，在此次序顛倒變成「用本守之，以末致財」，而成為農家的行為準則。因此，維生雖然還是首要的考慮，但同時卻要受到獲利取向的制約。書

中除了詳細介紹各式農業生產活動外，還鼓勵從事各樣的副業生產與進行商業買賣。所販賣者不再只是餘糧，而是依著糧價的季節漲落，高價時賣出，低價時買進。只是，在這樣一種以農業為本的經營基礎上，所企求的價值，依然是培養後代子弟唸書以求晉身官宦。（註三十六）於是，這樣一種講求私人經濟活動的生計之學，不過是在既有的士／農／工／商階序下，為個人及家戶尋得一個安身立命的位置罷了。原本著重於工商業經營的治生論述，開始將重點轉向農業經營，而日益成為地主的持家之學。

北朝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接續了這樣一個生計學的傳統，但更強地嵌在士／農／工／商的階序脈絡中。漢末以來的混亂局面導致塲墾等自足經濟單位的興起，工商業相對地不發達，造成務農之外的謀生選擇相對困難。賈思勰還明白主張說「治生之道，不仕則農」。原本為司馬遷排除在外的仕宦之途，現在也列入治生之道了。從獨立的經濟觀點倒退到從屬於政治與倫理道德之下，的情形，同時也表現在「家猶國、國猶家」、「舍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的議論上。在此，遵循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治家之道視為與治國之術無異，講述私人經濟活動的生計學於是又銜接回「政治經濟學」的脈絡去了。儘管有著這樣一個語意上的轉折，但就如《齊民要術》書名所顯示的，論題化的對象基本上還是平民的治家之術。因此，具體內容大致上無異於《四民月令》，但也包括了一些新而值得注意的討論，像是關於栽植商品作物與糧食作物的獲利比較、講求

《第一五五期》2000·7·1

從食貨到經濟



明代大儒王陽明也不得不承認「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集約經營、注意到資本與利息的關係，並討論了對於佃戶、雇工及傭人的管理等等。（註三七）

儘管治生之學的發展十分緩慢，但自漢以來，「治生」、「民生」與「生計」等辭彙已出現於各式典籍之中，顯示經濟已是社會生活中不可抹煞的面向了。不過，漢末六朝以來貨幣經濟與商業活動因動亂而倒退，這些與（尤其是指稱私家的）經濟活動有關的措施，尚未在論述中大量出現。一直到唐中葉貨幣經濟鞏固下來以後，尤其是自宋朝起，隨著商業繁榮、教育普及以及士商不分等等變化，治生等相關的詞彙才開始頻繁地出現於士大夫的議論中，（註三八）因為這時治生已成為他們現實生活中必須實際面對的問題。不同於以往治生論

述著重於持家貨殖之事，士大夫現在亟於掙脫的枷鎖就是義／利、天理／人欲對學的儒學傳統；換言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道德上證成士大夫治生的正當性。（註三九）於是我們看到理學的興起雖然一度延遲了這個趨勢，但是隨著貨幣經濟的深化以及士大夫慢慢喪失作為社會唯一代表的地位，最能維護以價值制約交換這樣一種做法的士大夫階層也不得不開始讓步。元代的許衡便已說「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而明代理學大師王陽明在學生一再詰問下也不得不承認「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平便提到，「聖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陳權則說「有私所以為君子。惟君子而後能有私，彼小人者惡能有私哉」。（註四十）

實用文學與經世濟民

相應於前述的變化，加上有宋一代因外患劇烈而使得人們講求理財與富強，統合先前分裂並趨於對立的富國與治生論述的努力也開始出現。北宋的李觀已認為須區別「富」與「強」之不同，而主張「安富」。南宋時，葉適進一步主張富民為「上下之所賴」，反對抑止兼併，認為政府應「保富」。明中葉的邱濬更認為私人需求的滿足乃是天下治平之基礎：「《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之義，諄諄以理財為言，豈聖人教人以興利哉！蓋平之為言彼此之間各得分愿之謂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積。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

當代

CON-TEMPORARY



隨著中西交流，康有為強調與外人通商的重要。

矣。」他並明白地區別「理財」為「理財財」與「理民財」兩個範疇，認為「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清初時的唐甄接續著葉適及丘浚聽民自利的想法，主張「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他強調富民的重要時，尤重「末富」。(註四一)

掙脫了義利對舉的語意束縛，並緩和了與富國論述的對立後，有理由推測以私家經濟活動為出發點的治生之學會日益鞏固下來，成為現實建構的一種觀點。只是根據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資料來看，似乎並未就此出現關於治生的系統性論述。就士大夫階層的撰述來說，除了前面提及的對治生的道德證成、調和富國與治生論述的努力外，清初的張履祥曾提出「治生唯稼穡」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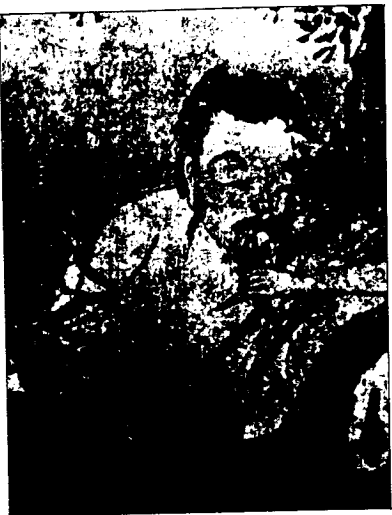
但不過是覆述以往的地主持家之學，且以守業為重，而不求貨殖，甚且貶抑「商賈技術之智」是「儒者羞為」。另外張英則在土地早為私有的現實基礎上，將孟子「為民制產」的說法改頭換面成「保民恆產」的主張，極力強調「蠶產之害」，亦是以地產與農業經營為最佳的治生之道。(註四二)就此來說，治生之學不僅未朝強調貨殖、經營，講求利潤與發展(擴大再生產)的方向發展，反而在土地持有關係變動日益劇烈的情況下，逐步退卻、保守，以守業、保產為第一要務。不過，在士大夫的論述之外，迄今尚保留有許多關於商業知識的實用手冊，(註四三)另外可能也有為數不少的商人撰述之作，乃至相關的碑刻或其它民間史料，是以治生之學無不存在著另一開展方向的可能。只是這些都尚未經人從語言的角度詳細地整理研究過，是以目前仍難以究斷其實際。

之後，隨著中西的日益交往，以及中國日漸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的發展，出現了像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等強調與外人通商、「商戰」乃至「以商立國」的想法。在情勢變遷以及接觸到西方不同經驗的刺激下，這些論述開始納傳統中富國與治生論述所無的成份。一九〇二年，嚴復所譯亞當斯密的《原富論》出版，梁啟超撰寫《生計學沿革小史》，並擬議撰寫《中國生計學史》，中國治生之學與富國論述的傳統正式與西方的現代經濟學接榫，並迅速地為後者所取代。(註四四)

在富國(富民、富家)與治生(資生、生計)之外，經世(經濟)則構成另一個指稱與經濟有關的事務的

當代

《第一五五期》2000.7.1



儒家「經世」一詞，出於莊子。

措辭傳統。令人意外的是，經世這個在後代看成是經世濟民的簡稱，體現著儒家積極用世精神的措辭，竟起源於道家《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一語。不過，在此之外，《左傳》及《周禮》便已分別有「經國家」、「經邦國」及「經邦治」等有著相近意涵的語彙。晉時向秀、郭象等做《注》時，多略過此句。一直到唐成玄英做《疏》時，才將之解為：「春秋者，直要到唐成玄英做《疏》時，才將之解為：「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故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志，記也。夫祖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成《疏》雖未將「春秋」一詞混淆為《春秋》一書，但以「憲章堯舜」等句來註解「先王之志」，卻不免開了後世援道入儒的後門。(註四五)尤其是，漢末六朝以來玄學與佛學大興，是以中唐後興起，由古文及復興儒學的運動交織而成，並發皇於有宋



梁啟超(上)與嚴復都釐重西方的經濟學。



一代的道學，早深受玄學及佛學的影響，《莊子》「經世」一語遂開始與孔子刪削之作《春秋》關聯起來，意指孔子藉《春秋》行褒貶，以為萬世立法。像程頤就明白主張說「《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註四六)撇開《莊子》這個文本的傳統不論，漢朝時儒士便已有了「通經致用」的說法，強調從經典習得處理實務的方法，尤着重在治國之術。(註四七)而且，從《後漢書》以來的歷代正史及其他典籍來看，「經世」一詞亦已普遍為人所使用，且多半不脫經營、治理、經劃世務、經世濟民等等的意涵。(註四八)東晉葛洪在《抱朴子》「內篇校釋」《明本卷》中，認為「歡慶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更是把「經世」的帽子直接安到儒家的頭上。由於「經世」這個語彙的意思符於儒家內聖外王的傳統，所以到了宋代反成了儒者自我認

同的主張，例如陸九淵便說「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重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

另外，「經濟」一詞自晉代起也開始為人所使用，但究其意涵，似尚不出於經營、經略、治理之意，而不及於經世濟民。(註五十一)從《孟子》及《周禮》早有一「經界」、「經土地」等措辭來看，「經」一字的原義或在於劃定界線，但也早引伸出經營、經劃、治理等意涵。何況上引《抱朴子》中也有「經世濟俗」的說法，「經濟」一詞不無為其簡稱的可能。(註五十二)《宋書》、《新唐書》及《舊唐書》中，則用「思略經濟」、「才周經濟」、「無非經濟之才」、「不復有經濟意」等詞來形容人，顯見除經營、治理的意思外，已混入了實用之學與經世濟民的意涵。循著這樣的脈絡下來，到宋朝時，「經濟」一詞的意涵實已與「經世」相差無幾，而常為人替換使用。(註五十二)

經濟獨立成爲一門學問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出於華夏文化中心主義而推崇尊王攘夷這樣的功事的傳統下，經世的想法傾向於着重事功的一面，而且往往易於在外患劇烈的歷史變局中昂揚。早在孟子之時，便已認爲孔子作《春秋》乃因應著「世衰道微」的情境，企圖藉此撥亂反正。而有宋代更是打破傳統「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的局面，在中原同時存著在「兩個天子」，外在威脅特別嚴重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經世」之說特別爲宋人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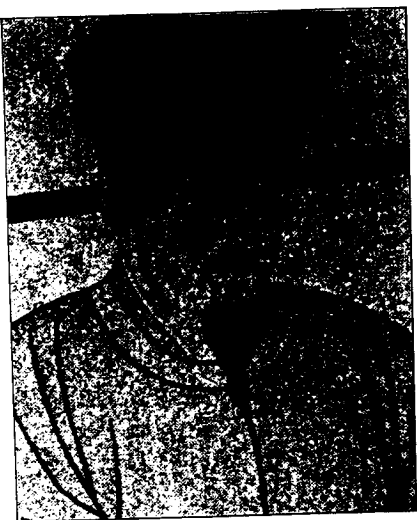
從食貨到經濟

雖然經世的論述並不以公／私或國／家的區分爲依據，但基本上仍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並往往以政府的角度與作爲討論的核心。只是，往往能在危機與世局遽變的刺激下，開展出不同於傳統觀察角度的可能。尤其是，在標舉著內聖外王、經世濟民這個符於正統的大纛下，經世之學往往是透過對「經」重新詮釋，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爲之。在抬出經典作爲變革依據的情況下，反而能成功地挑戰既有的做法。宋王安石以《周禮》爲據，進行新法的變革，當是最好的例子。自漢末動盪，異族入侵中原，佛道興起以來，人們對於儒家「修齊治平」的主張、對政治安排社會秩序能力的信心一度低落。隨著隋唐的統一，古文運動的興起與科舉取仕，儒家藉由出仕以「修己治人」、「經世致用」的傳統才逐漸恢復。到王安石推行新法，可說達到了相信政治能夠代表社會、能夠妥善地安排社會秩序這樣一個傳統的高峰。以國家對待經濟事務的態度爲例，在新法改革時期中，國家介入市場與經濟活動的主動程度，就整個傳統帝制時期來說是空前絕後的。然而，隨著北宋政權再度淪於異族之手，政治能創造出良善社會秩序的信心也就跟著衰退了。士大夫也不再只將目光投注於政治的中

心(首都、中央政府)，而開始發展與地方的關係。雖

視。另外，就《春秋》作爲史的傳統來說，人們認爲一方面固然闡明了常道，但也揭露了權變以因應世局變化的一面。從這樣一個脈絡所開展出來的經世思想，更往往將重點放在事功與權變上，是以「經世」在後世往往與「致用」連稱，而銜接上「通經致用」的傳統。也正因爲講事功與權變，所以儘管「經世」的想法符於儒家「外王」的主張，但在受到儒家王、霸之辨的另一傳統影響下，當有志之士在宋代將「經世」的想法落實爲實際的富強權變之術，而銳意革新時，往往便被扣上法家或只講霸術的帽子，逼得這些人在講明富強之術的同時，不得不對傳統的王、霸之辨做出新解。(註五十三)又觀諸《宋史》的記載，稱之爲有「經濟之才」或「經濟之志」者，更清一色是主張功利權變一路者，如葉適與陳亮；另朱熹亦曾用此來形容王安石及陸贄。可見在時人的用法裡，「經濟」一詞的意涵比起「經世」來說甚且更爲特定。相對地，一直要到《元史》中，在追諡朱熹的讀語中我們才看見用「負經濟之長」來形容朱熹這位理學家。

儘管「經濟」與「經世」二詞容或有這樣的細微區別，但從宋人的使用看來，二者基本上是同在區分的一邊的。只是，雖然「經世」之說不免以富強之術爲重點，但區分的另一邊卻不再是富家或治生，而是講究心性的哲思或理論性知識。換言之，區分的主要界限在於「致用」與否，在於內／外、事功／道德之別，而非循著公／私或國／家的差異做出。循此，經世之學指涉相當廣泛的實用之學，包含了傳統的富國論述但不限於此，像教育及選擇官吏的方法、軍事策略、財政行政、農業



王安石的
新法，
尤以理財爲核心議題。

CONTEMPORARY



宋代
宋儒陸九淵力主儒者
經世、出世的重要。

然，經世的論述並不因此而稍減，但就整體的知識氣氛與時人的心態來說，卻出現了一個從主動到消極、從外向到內斂的轉折。(註五六)在某個意義下，政治代表著社會的信心的動搖，是有助於功能分化趨勢進一步開展的。相應地，經世論述在某個程度上將得以漸漸發展出的擺脫掉以政治爲中心的觀點來。不過，隨著漢人政權再度君臨中國的明朝，這樣一個內向的轉折卻是強化了中央集權的趨勢，以及退回到以農業爲主的經濟形態去，政治反而是以加強控制其它系統的方式來維繫處於日益飄搖的中心地位。

一八六二年，「經濟學」一詞首度出現於日英辭典中，用以翻譯economics。用「經濟」這兩個漢字來譯economy的做法後來傳回中國。一八九五年，光緒皇帝重開「經濟特科」，但此時「經濟」二字所指的顯然已不同於傳統用法中具有較廣泛意涵的實用之學，而是沿襲日文的譯法，採用現代西方對經濟二字的理解了。

一九〇七年，陸續有像「法律經濟辭典」等直接

譯自日文的工具書，或是對經濟一詞沿用日譯的工具書（如Yang Huiqing《英華大辭典》）出版，此後，經濟一詞便逐漸地在中文的使用中取得了指稱經濟事務的代表性語彙的地位。（註五七）就台灣一度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來說，同時承襲了日文及日後中文的用法。現在，經濟一詞有了無法從中文原字得出的，而是承繼西方近功能分化情境而有的意義，現在可做有效率或合目的理性的這樣的形容詞用，牽涉到的是諸配置間的選擇以及手段與目的間的關係。正是在這樣一種「功能性的」意涵下，「經濟」獨立為一種實在建構的觀點，促成了原本零散發生的事件銜接起來成為一個具自主運作邏輯的系統，而不再只限於處理像維生這樣特定而具體的事務。現在，站在區分另一邊的是政治、宗教等等不同的功能領域了。

對於指稱的這樣一個選擇，固然有其歷史的偶然因素，例如像日本率先西化進行明治維新，以及中文後來大量採用日文對於西方概念的譯法；但將目光放回我們剛才審視過的語意演變過程來看，這樣的選擇似乎亦非全然任意。就食貨這個最早的措辭來說，嚴格說來，尚未構成對整體經濟事務的指稱。用現代經濟學的分類架構來看，自春秋、戰國時期起以來的富國／富民論述，基本上則只關注於總體經濟或國民經濟的面向，而且多緊密地鑲嵌在政治的脈絡中。後來治生、生計之學的興起，算是開啓了關注近於今日所稱的個體經濟或企業經濟領域的傳統。尤其，隨著士／農／工／商階序的鬆動，維生對士大夫來說是個日益急迫的問題的情形下，人們有擴大治生、生計這些語彙的外涵的傾向，駭駭然

（第一五五期）2000·7·1

從食貨到經濟

經濟的層面，但就「修齊治平」的脈絡來說，未嘗不能將治生持家的意思涵括在內。尤其，當「經濟」這個語彙繞道日本而回到中文後，作為經劃對象的客體——世界或國家——被取消掉了，所突顯出來的毋寧是經營、管理的意涵，從而一方面能接續上中國原有的傳統，另一方面又較近似西方當代的看法。

不過，我們不難從上述的歷史建構中看出，儘管經濟系統在中國分化出來了，儘管也建立起了貨幣與價格

有獨立為一種看待世界的觀點的趨勢。即便如此，這兩個語彙還是無法將傳統的富國論述的內涵包括在內。經世與經濟的措辭則自始便有廣泛的指涉。雖然關注的焦點基本上和富國論述相同，在於政治系統的作為與總體



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進行西化。

電代

CON-TEMPORARY

這些自己的特殊語言，但卻沒能促成對系統統一性進行與論題化的理論出現，因為連整體經濟事務加以指稱的措辭都仍有所闕如。從運作／觀察、結構／語意的區分來看，這樣一種自我觀察圖式的闕如，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經濟系統的運作與分化出來。這相當程度上也是促成儘管中國很早就展開了向功能分化的過渡，但諸功能系統間卻不是按著功能關係來安排，而維持著某種程度的上／下階序關係的原因之一吧。

- （註一）·Luhmann, 1991g, p. 105.
- （註二）·雖然有著不同的進路，Hansen, 1985; Schirrauer & Hymes, 1993, pp. 5—12, 持有與我們相近的立場，值得參考。
- （註三）·關於三種不同的記憶類型，亦即時間性的／空間性的（物質性的）／結構性的記憶，及其特徵，參見Krippendorf, 1975.
- （註四）·Spencer Brown, 1979, p. 1.
- （註五）·參見Baacker, 1997, p. 20.
- （註六）·參見Luhmann, 1994, p. 60.（註三〇）。
- （註七）·原文為Elisabeth Fox-Genovese對於重農主義觀點的總結，轉引自Luhmann, 1994, p. 97.
- （註八）·必須提醒的是，維生這個論題並不是想當然耳地就會進到社會系統之中的，而是與農業定居社會及政治制度的出現有著一定的關聯。
- （註九）·關於這個落差的問題，參見Staheli, 1998, 的討論。
- （註十）·關於這個問題，須待他日另行為文討論。

- （註十一）·在傳統中文的用法裡，貨既可解做貨物，也可解做貨幣。後者毋寧是晚出的意涵，但具體地彰顯出人們认识到了貨幣固然也是一種商品，但卻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亦即作為交易媒介的「通貨」（見《管子》〈輕重乙〉，另《管子》〈國蓄〉有稱為「通施」的用法）。就《洪範》所描述的時代背景來考量，農用八政中的貨主要當指貨物而言。然景來考量，農用八政中的貨主要當指貨物而言。而，隨著貨幣經濟的日益蓬勃，尤其是當貨幣成為執政者藉以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而人們卻依然用食貨一詞來指稱經濟事務時，貨一詞所強調的意涵毋寧日益轉向貨幣。當班固作《漢書》〈食貨志〉引《洪範》的說法時，便已注意及此，而將貨解作「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Nancy Lee Swann的《食貨志》譯本，亦將重點置於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上，參見Swann, 1950, p. 109.
- （註十二）·Huan-Chang Chen, 1911, p. 48, 主張「理財」一詞才是economics的適當翻譯，而非口譯

所採用的「經濟」一詞，並認為傳統中國用以指稱經濟事務的主要措辭便是「理財」這個字面意義十分清楚而不需多做解釋的措辭。但除了《周易》之外，他並未給出其它具體的文獻證據。依我們對典籍檢索的結果以及語意演變的研究看來，這樣的主張恐怕是有待商榷的。除《周易》《繫辭》外，其它先秦典籍中似未有用上「理財」這個詞彙。而後世提到理財時，多半便是引述《周易》「理財正辭，居賢使能」一句，最著名的例子是王莽變法。此一詞彙廣泛地為人使用，當是自宋朝始，不過先前《太平經》中便曾出現過「理財貨」、「理財產」這樣的措辭，另《通典》也有「理財賦」的說法。

(註十三)：春秋之際，史書中尚不見有「富國強兵」這樣的措辭，參閱錢穆，一九八四，頁四一以下，蕭清，一九九二，頁六二，(註二)。

(註十四)：另外一個與經濟事務有關，但顯然有著更廣的指涉內容的措辭是「民生」及「厚生」。(《尚書》《君陳》有「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一語，另《尚書》《大禹謨》已有「正德、利用、厚生」的連用。《左傳》《文公七年》亦載說，夏書有六府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的說法，《左傳》《成公十六年》則有「民生厚而德正，利用而事節」的記述，另《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亦有「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的說法。按「民生」一詞其意當泛指人民之生活，但應以物質生活的基礎為重，即後世所謂之「生計」。就厚生的想法來看，所論題化的亦是統治者對於人民經濟生活的

照料，是以基本上可併入富國／富民的論述中一併觀之。

(註十五)：「沒有一個區分是沒有動機的，而且除非內容視為在值(value)上有所不同，否則不會有動機。」「如果某個內容是有價值的，那麼就可以用某個名字(name)來指稱這個價值。」Spencer Brown, 1979, p. 1。

(註十六)：即《荀子》《王制》所說「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篋，實府庫。」到了漢朝時，《淮南子》《齊俗訓》則以有餘／不足、本／末這兩組區分進一步發揮：「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

(註十七)：參見趙靖編，一九九六，頁一七一—一八九，二七三—二八三，三二六—三四二，五七四—五七七，以及《國蓄》、《揆度》兩篇。值得一提的是，成書於所謂稷下學者之手的《管子》一書，中間可能不乏荀子的貢獻或影響，殆荀子曾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又我們同意杜正勝，一九八八，《管子》一書成書於戰國中葉前的主張，但保留後世竄入些許段落或文句的可能性。

(註十八)：參閱趙靖編，一九九六，頁一三〇—一三三。
(註十九)：參閱趙靖編，一九九六，頁一八六、二八〇。
(註二十)：歷來對「開阡陌封疆」一詞解釋不一，漢以來通說多以為是立下阡陌之制，將開闢為設立之意

從食貨到經濟

〈第一五五期〉2000·7·1

。Swann《漢書》《食貨志》的翻譯便採此說。另解則以開為廢之意。相關的討論請參見Oberst, 1996, p. 99。(註四十)：杜正勝，一九九〇，頁四七，一八一—二；趙岡與陳鍾毅，一九九二，頁三七—四〇；趙靖編，一九九〇，頁一八一—二。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井田制度的崩壞是個多線並進的漸進過程，商鞅變法毋寧是這整個演變過程具終局性效力的結束而已。

(註二一)：參閱《荀子》《富國》：趙靖編，一九九六，頁一三六—一四一，三三〇—三三三。

(註二二)：參閱《管子》《五輔》：趙靖編，一九九六，頁二七七—一八，二九二—二九六。必須一提的是，一般而言，《管子》一書是以人的自利心為立論基礎的，認為「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由此並得出了政府不宜干涉經濟活動的結論，而與同從自利心出發，但卻得出政府應嚴格限制人民的逐利活動的秦晉法家在主張上有著極大差異。

(註二三)：參見《周禮》《地官司徒》：趙靖編，一九九六，頁三八—三九八。進一步可參考Oberst, 1996, pp. 57—60。關於她所謂「市場進路」的討論。雖說《周禮》所言不能盡信為實際上曾實行過的制度，甚至也不能視為反映先秦時人們的想法，而必須保留摻入西漢時人才有的想法這樣的可能性，不過，就參酌貨幣發展的歷史，《管子》書中對於經重之術的討論，以及李悝確曾行平糶之法的例子來看，文中所提及的毋寧可視為先秦已有的觀念。

(註二四)：《戰國策》曾引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與《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引稍異)，足見「治生」一詞至遲自戰國時起就有了。又筆者不同意習見認為治生在此時(至少，漢以後)僅指經商的主張。《史記》《貨殖列傳》固然是將重點置於商人與經商，但文中同時也明白地指出農、工、商、虞皆為衣食之源，顯然皆為治生之道。尤其是文中明述「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夫織當筋力，治生之正道」，並對照《史記》《封禪書》「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

一句來看，治生在當時當指以某業為生、經營生計之意才是，並不限於經商一途。後來《太平經》中便屢屢出現「治生」、「治生聚(或畜)財」的措辭，亦難以皆歸於僅指商業而言。另《史記》《貨殖列傳》在敘及先秦的大商人時，一開始便談到越王勾踐用范蠡計然(計然為人名或書名，辜且不表)的策略，以參與市場，透過平糶的方式來調節穀價，安定人民生活，似乎顯得治生之說仍屬政治經濟的富國／富民論述範疇。但從「范蠡既嘗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的敘述以及後面對其他商人事蹟的描述看來，治生的論述畢竟是面對其他商人為出發點的，所着重者在富家，而非富國。前面有關政治經濟的敘述不過說明了，在范蠡看來，治國的「總體」經濟策略與富家的「個體」經濟策略有著一貫的原理。「上則富國，下

當代

CONTEMPORARY

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一句也反映出司馬遷持有類似的觀點。但到後代，富國與治生（富家）的論述就分道揚鑣了。並請參閱杜正勝，一九九〇a，頁四九一—九二，勞幹，一九九〇，頁五二八。

（註二五）：這相當程度上與當時市場上主要商品是糧食有關，殆後來鹽鐵興起，並日漸成為具壟斷性質的商品後，資本的雄厚與否遂成為商人能否獲巨利的另一關鍵因素。參見杜正勝，一九九〇a。

（註二六）：這樣的觀察與措辭有可能是建立在易經以來探求變易的傳統以及道家物極必反觀念的基礎上。

（註二七）：上述的討論除參見《史記》〈貨殖列傳〉原文外，並可參考趙靖編，一九九六第十章。

（註二八）：又《管子》已有這樣的主張。

（註二九）：參閱 Spengler, 1964。

（註三十）：從體例來看，嚴格說來，《漢書》是以《食貨志》取代《史記》的《平準書》，而非《貨殖列傳》，而且《漢書》中亦仍保有《貨殖傳》。但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平準書》主要是關於國家經濟政策演變的記載，而非出自對經濟進行觀察的旨趣所做，《貨殖列傳》才真正地代表了關於經濟的論題化。《漢書》則反其是，《貨殖傳》基本上只是抄襲《貨殖列傳》，《食貨志》才體現了對於總體經濟事物的論題化。又《漢書》〈司馬遷傳〉裡面提及司馬遷時，認為他「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序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可見班固明白地意識到他

與司馬遷在立場上的差距。然而，除了體例及史家人格特性的差異外，我們認為，《貨殖列傳》與《食貨志》之所以代表著不同的觀點，時代的差異毋寧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註三一）：即《史記》〈貨殖列傳〉所謂「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註三二）：參見氏著 1993。

（註三三）：主張「均平」、「齊黎民」的具體例子可見於《鹽鐵論》中的辨論，尤其是《輕重》一篇。儘管辦論的雙方對於鹽鐵官實是否能達成「均平」的目的或適足以書之有著不同的看法，但顯然都贊同「均平」這個目的。

（註三四）：參見趙靖編，一九九五，頁八四—八六。

（註三五）：生計之學並非當時的措辭，「生計」一詞似亦直到晉代才開始為人所使用（參見《晉書》列傳《忠義》關於王豹行止的敘述）。在此，我們並非以後來梁啟超用來譯經濟學一詞的意思來使用這一個詞彙的，我們所看重的在於以家戶為單位對於維生或者說經濟的經營，所以亦可稱做「持家之學」。這接近於歐洲史上所謂的家長文獻(Hausvater-literatur)，對此請參閱 Bruner, 1980, pp. 144ff. 趙靖編，一九九五，頁一〇〇—一〇二、二八九，則認為，《四民月令》只能看作是地主的治家指南，還構不上是地主的治生之學。

（註三六）：參見趙靖編，一九九五，頁一〇〇—一〇二。

（註三七）：參見趙靖編，一九九五，第三十四章。

〈第一五五期〉2000·7·1

從食貨到經濟

（註三八）：舉例而言，「治生」一詞散見於《太平經》、《藝文類聚》、《三國志》等書中，又有「治生積貨」（《論衡》）、「治生產」（《南齊書》、《梁書》）、「治生事」、「治生業」（《新唐書》）之類的措辭。《宋書》列傳《顏延之》及《梁書》本紀《武帝》則各有「蠶溫農飽，民生之本。」

「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的說法。「生計」一詞則可見於《晉書》列傳《忠義》、《通典》「選舉典」（《雜議論下》）及《舊唐書》列傳《狄仁傑》。宋以後，對這些措辭的使用更是頻繁，僅以《朱子語類》為例，像「民生日用」、「治生產業」這些為後代所習用的辭彙，便多處可見。

（註三九）：參閱余英時，一九八八，頁九二以下。

（註四〇）：參閱趙靖，一九八八a，頁，五一—五，余英時，一九八八，頁九二—三，一〇二—三，顧炎武之語引自頁一〇三，（註一一）。

（註四一）：參見趙靖，一九九八，頁四〇一、四三三—四三三；一九九八a，頁四六四—六八，四九五—七四三；人們往往將李觀、葉適等與王安石相提並論，歸之於宋以來新興的講求功利的傳統，但他們對於抑制兼井與否以及對國家角色的期待顯然有所差異。

（註四二）：參見趙靖，一九九八a，第二十四章。

（註四三）：例如參見余英時，一九八八，頁二二—二二二，三，所學者。

（註四四）：清末時，economics一詞流行的中譯似為理財，如曾為康有為弟子的Huan-Chang Chen在其於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便持此見，另嚴復

於一八九八年在譯《原富論》一書時亦說，economics「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願必求吻合。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不過就嚴復與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張元濟之通信看來，嚴氏偶也會使用理財一詞代替計學。另梁啟超亦曾以「養生學」譯economics。參見王樹槐，一九六九，頁六七、七六；賴建誠，一九九九，頁六三—六六；Huan-Chang Chen, 1911, pp. 48—51。

（註四五）：參見林保淳，一九九一，頁二六—二八。

（註四六）：引自林保淳，一九九一，頁二八。值得一提的是，道學不盡同於理學，而有較廣泛的指涉。宋初自視或視為是道學家者如范仲淹、張載、歐陽修等，於「外王」的面向，多所強調。而後來由程、朱所開出的理學雖未偏廢「外王」的面向，但不可諱言，其用力之處乃在於心性。從《宋史》中對於人物的記載與品評，不難看出此點。

（註四七）：參見余英時，一九九二，頁一〇〇。另《顏氏家訓集解》卷第三《勉學第八》註中即舉例，「漢有通經致用之說，謂治一經必得一經之用也。如平當以《禹貢》治河（見《漢書》本傳），夏侯勝以《洪範》察變（見《漢書》本傳），董仲舒以《春秋》決獄，（《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有《公羊春秋》決獄，）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邵傳》：「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王氏以三百五篇當諫書（見《漢書》《儒林傳》），皆其例證。」

當代

CON-TEMPORARY

〔註四八〕：以史書而言，像《後漢書》列傳《西光傳》《渙中月氏胡》有「志經世之遠略」、《後漢書》列傳《南匈奴列傳》有「忽經世之規」、《晉書》列傳《陸機》有「聞經世之算」、《晉書》列傳《庾亮》有「才不經世」、《宋書》「志」《樂》有「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晉書》列傳《陸機》有「無經世之大方」、《魏書》「本紀」《帝紀》《高祖孝文帝》有「闡經世」、《舊唐書》「列傳」《列傳第三十》、《史臣曰》有「臺臺有經世遠略」等句。就其它典籍來說，《抱朴子》《內篇校釋》《塞難卷》及《地真卷》各有「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一句。《通典》則以《後漢書》為據，分別於「邊防典」《西戎》《渙中月氏胡》及「邊防典」《北狄》《南匈奴》中出現「忽經世之遠略」、「忽經世之規」、「自後經綸失方」這樣的文句。另外像「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經世字民」、「經世成務」、「無經世之大方」則分見於《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尹》、「雜文部四」《檄》、「居處部二」《闕》、「居處部四」《宅舍》等篇。

〔註四九〕：引自余英時，一九九二：頁四二〇。反諷的是，「內聖外王」這個觀點最早同樣出自《莊子》《天下》一篇，見余英時，一九九二，頁一八五。

〔註五十〕：《晉書》列傳《長沙王》有「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一句；《晉書》列傳《殷浩》的敘述則為「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

《第一五五期》2000·7·1

從食貨到經濟

實的情況下，自孟荀之分開始，便不免出現畸重畸輕的強調，從而有著立場上的爭論。由於經世之學不只注重實際知識，更注重實際的結果，因此很容易與傳統的王／霸、儒／法區分的爭執糾纏在一起。關於所謂兩極性的問題，並請參見Schwartz, 1975。就人們處於宋朝時代變局下對此問題的回應，可參考Tilman, 1982，對朱熹與陳亮的辯論的討論。

〔註五四〕：例如《宋史》《藝文志》便已登錄有《經濟集》十二卷，《儒林傳》也提到劉顏著有《經濟樞言》數十篇。《明史》《藝文志》中登錄有以經濟為書名者像是《經濟錄》、《經濟考略》、《經濟總論》、《山林經濟籍》、《經濟類編》等，並分別列入「史部」「故事類」、「子部」「雜家」，被列入「史部」「故事類」、「子部」「雜家」，「子部」「小說家」及「子部」「類書」等不問地

參考書目

趙岡、陳鍾毅，一九九二：《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三印。台北：聯經（一九八六）。

杜正勝，一九八八，關於《管子》《輕重》諸篇的年代問題，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九：一〇六三—一〇八六。

杜正勝，一九九〇：《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二版。台北：聯經。

杜正勝，一九九〇a：《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一：四

足以經濟。」

〔註五一〕：當代人的印象多以為「經濟」是「經世濟民」的簡稱，但就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的瀚典檢索系統所得的結果來說，不見「經世濟民」一詞，只見「拯世濟民」、「救世濟民」、「憂世濟民」等語。Oberst, 1996, p. 3-4 提及「經世濟民」比「經濟」一詞更早出現，但不知所據為何。就筆者目前所知，「經世濟民」一詞或晚至明末清初才出現，如李塉提到「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引自余英時，一九九二，頁四二八。不過這仍待查證。另《朱子語類》卷九十四《周子之書》《通書》《志學》一篇中，則有「經世濟物」的說法。

〔註五二〕：又依《金史》列傳循吏《傅慎微》的敘述，宋代似有「經濟使」一職的設置，然在漢籍電子文獻檢索結果中卻未發現職官志中有此官職，何以如此，仍待來日查明。

〔註五三〕：例如李觀便主張王霸之別係繫於其為君王或諸侯的地位，而非技術上的差異，並進而主張王霸皆各有粹駁，王政非純用仁義而已。參見蕭公權，一九八五，頁四六〇—六一。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爭論，究其源，乃來自儒家學說中本身便有的內聖／外王、心性／事功、知／行等等的兩極性。依「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構想，從修己（內聖）到治人（外王）是個一致、和諧且連續的過程，然而在面對複雜的現

當代

CONTEMPORARY

方。至於以「經世」為書名者，則可舉宋邵雍的《皇極經世圖說》，元朝的《經世大典》與明朝的《經世文編》，乃至明馮應京的《經世實用編》與劉鑾的《經世宏業》為例。另請參見Oberst, 1996, pp. 3-4, 13-4。

〔註五五〕：參見《清史稿》「選舉志」《制科》。

〔註五六〕：這樣一個轉折已吸引過許多人進行研究，在此僅舉數例：de Bary, 1976; Hymes, 1986; James T. C. Liu, 1986; Bol, 1992; McMullen, 1988; Hymes & Schirokauer, 1993; Ray Huang, 1997, Chap. 11-14。

〔註五七〕：參見《清史稿》本紀《德宗光緒二十四年》：主樹槐，一九六九：頁六八；Oberst, 1996, pp. 4, 20 (註十)，(註十一)。

八一—五二六。

蕭公權，一九八五：《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冊，三印。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賴建誠，一九九九：《〈原富〉、嚴復與中國》，刊於《當代》一四二：六二—七五。

勞幹，一九九〇：《對於「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的意見》，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一：五二七—五三一。

林保淳，一九九一：《經世思想與文學經世：明末清初

- 經世文論研究》。台北·文華。
錢穆，一九八四·《國史大綱》，第一冊·十一編。台北·商務(一九八〇)。
王樹槐，一九六九·《清末繙譯名詞的統一問題》，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一·四八—八二。
蕭清，一九九二·《中國古代貨幣的歷史》，重印本。台北·商務(一九八七)。
余英時，一九八八·《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重印本。台北·聯經(一九八七)。
余英時，一九九二·《中國繙譯傳統的現代發展》，重印本。台北·聯經(一九八七)。
趙世瑜，一九九五·《中國繙譯與晚清》，第二冊。北京·北京大學。
趙世瑜，一九九六·《中國繙譯與晚清》，第一冊·重印本。北京·北京大學(一九九二)。
趙世瑜，一九九八·《中國繙譯與晚清》，第一冊·重印本。北京·北京大學。
Baecker, Dirk, 1997: Wiewiel Organisation braucht die Organisation? Oder warum wir uns mit scheltdelinierten Systemen wohler fühlen. In: *Organisationsentwicklung* 16, 2: 18—25。
Bol, Peter K., 1992: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runner, Otto, 1980: Das ganze Haus und die alteuropäische Ökonomik. In: *Neue Wege der Verfassungsverfassung — und Sozialgeschichte*, III/2, 101—111.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56)。
Chen, Huan—Chang, 1911: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New York: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ulha University。
de Bary, Wm. Theodore, 1976: 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 In: Arthur F. Wright(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81—111. Chicago &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
Eisenstadt, S. N., 199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重印本。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63)。
Hansen, Chad, 1985: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uth*.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 3: 491—519。
Huang, Ray, 1997: *China A Macro History*. 重印本·Armonk\New York\London: M. E. Sharpe(1988)。
Hynes, Robert P., 1986: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論評

〈第一屆年會〉2000·7·1

CON—TEMPORARY

從錢穆與蕭清

-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ynes, Robert P. & Conrad Schirokauer(eds.), 1993: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rippendorff, Klaus, 1975: Some Principles of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in Society. In: *General Systems* 20: 15—35。
Liu, James T. C., 1988: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iklas, 1991: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 Über Beziehungen zwischen Zeithorizonten und sozialen Strukturen gesellschaftlicher Systeme. In: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1998/2: 315—339。
Swann, Nancy Lee, 1950: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 The Earliest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to A. D. 25. Han Shu 24, tr. by Nancy Lee Sw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llman, Hoyt Cleveland, 1982: *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berst, Zhihong Liang, 1996: *Chinese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Economic Ideas in the Song Period (960—1279)*. Disserta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irokauer, Conrad & Robert P. Hynes, 1993: Introduction. In: Hynes & Schirokauer(eds.), 1993, pp.1—58。
Schwartz, Benjamin, 1975: Some Polaritie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Arthur F. Wright(ed.),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13—1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pencer Brown, Georg, 1979: *Laus of Form*. New York: E. P. Dutton。
Spengler, Joseph J., 1964: Su—ma Ch'ien, Unsuccessful Exponent of Laissez Faire. In: *Th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0, 3: 223—243。
Stahel, Urs, 1998: Die Nachträglichkeit der Semantik. Zum Verhältnis von Sozialstruktur und Semantik. In: *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1998/2: 315—339。
Swann, Nancy Lee, 1950: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 The Earliest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to A. D. 25. Han Shu 24, tr. by Nancy Lee Sw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llman, Hoyt Cleveland, 1982: *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